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赵晓虎

鞍山师范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文学特性的元根性考察”“回到世界文学命题之初”“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三个方面，力争在对中华民族文学的生存环境的考量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文学思想的解读基础上，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对中华民族文学的本质特征的把握应该从它的发生学角度入手。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偏僻、封闭而又相对广阔的文化领地生存繁衍，经过漫长曲折民族融合后最终形成包括汉民族文化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复合文化。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西方列强入侵等一系列的惨痛事实面前，中国文学所固有的“世界中心”地位无奈地让位于西方文学，从而被迫退居到世界文学边缘的位置。随着资本主义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各个国家民族文学原有的封闭性自给自足性被打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歌德、马克思等历史伟人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讯息，机智地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重新阅读这些经典论断，给我们带来诸多深刻的思想启示。

在中国被动接受世界文学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已然进入一个全球一体化时代。在当下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随着中国由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发展策略和模式也必须进行重新思考。在遵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应循序渐进地处理好如下关系：首先，处理好中国本土文学间的关系，诸如“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等关系。其次，处理好与印度、伊朗、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民族文学关系，进而处理好与其他“东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最后，处理好与西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诸如中德、中法、中英、中美等关系，其中“独语与对话”“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最为迫切。

关键词：中国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全球化、独语与对话、中心与边缘

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Zhao xiao-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s&Literature, Anshan Teachers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114007,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observe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asing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king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advanced by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thesis was writte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name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globalization" Context, the Form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On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We should grasp the Mastery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 from literary genealog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orm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People live and reproduce in remote, closed and broad Region. It finally formed compound culture including Han ethnic culture and more than 50 national minorities culture after the long course of nationality integration.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year of 1840, the world center pos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given place to Western literature ,the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forced to pushed into the world literature edge position. With the dominate status of capitalism in world market, western civilization entered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Goethe and Marx further Keenly aware era's message and gave rise to their main theme "world literature". Their ideas of the chapter and verse are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u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western civilization entered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and the world entered the period of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atus of china from a super nation in Population to economy, We sh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o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law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ed to handle

som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step by step as follows:

First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y and Han Nationality. *Second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 Iran · Vietnam · Japan and so on, then further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other "Orient" countries. Final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 England, America and so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Edge” “Monologue and dialogue” is becoming the most crucial problem.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Center and edge, dialogue and monologue

生活繁衍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有着趋向全球化的天然基础。就宏观来说，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及传播与影响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只不过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它们基本上处在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活动范围的增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始慢慢的接触交往起来。起初这种交往大多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呈现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变得十分迅速。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往这样紧密，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化”问题俨然成为现代人广泛关注的世界性话题。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全球化的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劳动秩序。^①其实，全球化的内涵和使用范围是极其广泛的，结合当下语境全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1 历史过程的全球化；2 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3 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的全球化；4 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 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 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 理论话语的全球化……其中“历史过程的全球化”涵括其他诸多方面，或者说后者是“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因此，要想对任何一个领域的全球化做出科学的阐释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维度中进行，探讨中国文学的全球化进程也不例外。

中国文学特性的元根性考察

在探讨中国文学的全球化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进行简要的考察。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②探讨中国文学的本质，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大陆的地理生态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最初物质生活和生产

方式，作为先天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都潜移默化地保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学之中。

中国地理环境数万年来大致保持着如下几个特点：一、偏居一方的地理位置。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发祥地一样，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也处在北半球的“中纬度文明带”，但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位于北半球文明带的最东端，距离其他文明中心的路程相对较远。在海上交通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这种偏远的地理位置利于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利于同其他文明取得交流，是形成中国文化“保护性反应机制”的重要条件；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文明区的地理位置偏居亚欧大陆的东部，它本身的地理环境又显得封闭和孤立：中国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而黄河、扬子江滋润着的土地又极其广阔，从而形成一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完备的“隔绝机制”，这一点可以从“中华”“中国”的原出含义中透露出来。而这种封闭隔离的大陆民族文化正是一个独立的古代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三、条件优越的农耕世界。从地形上看，中国地貌的总轮廓、总趋势为西高东低，自西向东逐级下降，构成巨大的三级阶梯状斜面。尽管世界古代文明大多是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成长起来的，但无论尼罗河谷地及其三角洲平原、两河流域平原还是印度河平原，其范围和面积都无法与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相比拟。在气候条件上，中国东部自北而南依热量差异分为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一国范围内出现这么多气候带，世界上非中国莫属。此外，季风气候也为农业发展带来了雨露的惠泽，这使得中国文明在气候和环境上拥有了世界其他几个古典农业文明发源地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中国文明的产生以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退，和这一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无关系。四、幅员辽阔的文化领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占有最辽阔的文化领地，这使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即使受外来文化冲击，也不会由于山穷水尽而灭于一域，更不会遭到地中海文明区各文明之帮相互更迭、相继覆灭那样的厄运，这是中国文化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③中华民族在这样偏僻、封闭而又相对广阔的文化领地生存繁衍，经过漫长曲折民族融合后最终形成包括汉民族文化和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复合文化。

冯天瑜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一文中写道：“我们在考察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征时，必须首先把握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衍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当我们进行这种综合考查时便会发现，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一种区别于海洋民族的大陆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文化；是一种与中世纪亚欧的等级制度和印度种姓制度相出入的宗法制度的文化。地理环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的这三个层次的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系列优长与缺失，都与此或远或近、或深或浅地存在着内在联系。”④这种复合性的大陆民族文化、农业社会文化和宗法制度的文化类型往往体现出如下特征：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多样性等。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度、民族本身都是一个复合的共同体。“中国”一词自西周时出现到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说法，三千年间存在着各民族认识身份和选择文化态度的过程。未能复合进汉民族这一共同体的部族迁徙到交通阻塞的边远之地，逐渐衍化成少数民族。连“汉人”这一民族称呼，也是契丹族进入中原之后使用的称呼。这种复合融生特征最初在《诗经》这一文化典籍中得到集中体现。《诗经》中的篇章大都创作于周初至春秋末叶，来源于若干诸侯国家和地区，具有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等地域风格。在偏僻封闭以种植业为主的国度里的中国古代人眼里，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天下就是世界、人间。《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中国古代人这种宇宙观的体现。在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这样的表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中的“天下”“宇内”“四海”“八荒”等词为同一意思：中国人眼中的全宇宙。中国中心的宇宙观使中国古代人相信，中国人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而中国创造的文化也必然地优越于其他民族文化。在这种宇宙中心的幻觉中，华夏民族曾创造出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文明。在文学领域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学接受与影响主要在东方文化圈内进行：在文学接受方面，中国文学主要来自印度佛教文化影响，季羨林先生认为在中国广义的文学远在六朝以前就已经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在文学影响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对东亚、东南亚文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最高表现是（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的）儒教文化圈的形成。中国以“世界中心”“文化中心”的优越心态与其他民族与国家进

行文化交流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

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西方列强入侵等一系列的惨痛事实面前，中国文学所固有的“世界中心”地位无奈地让位于西方文学，从而被迫退居到世界文学边缘的位置。1840 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拥有数千年辉煌传统的古典中国的解体 and 现代中国的建筑进程的开端。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无不感慨地说道：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特定的语境压力下，中国第一批觉醒了的仁人志士开始睁开眼睛观看世界，中国的民族精英开始走上慢慢的西天取经之路。中国文学亦不得不寻求新的历史生长点，在围绕着“封闭与开放”这一矛盾争论中，中华民族文学开始融入世界文学的历史语境之中。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学滋生出世界文学欲望和意识是以惨痛的代价为前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民族文学的自卑从根本上阉割了自身世界文学的选择权利，主要表现为被动地接受世界文学而非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学，异域文学进入中国并非其文学本身突然强化了它的辐射力，亦非中国文学在全面地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后，坦然地找到了彼此接轨的内在契机，而是惊慌失措中的极端之举；中华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选择上的被动接受带有极大的盲目性，缺乏对彼此文学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评估，从而造成世界文学选择进程中民族主体性缺席和异域价值膨胀。

中国文学地位由东方区域中心向世界边缘的变化，恰好与歌德、马克思等人对“世界文学”论述的时间点相吻合。

回到“世界文学”命题之初

文学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交流的高级存在形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其形成和发展中都伴随着与其他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情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各个国家民族文学原有的封闭性自给自足性被打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歌德、马克思等历史伟人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讯息，机智地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时代。重温经典作家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思想是我们切入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歌德（1749—1832）最早提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对美学范畴。1827年1月31日他在谈到中国传奇和贝朗瑞的诗时，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⑤歌德谈话的理论意义在于：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的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它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深刻启示：第一、他强调不同的民族（譬如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是相通的，是“同类人”。这一论断肯定了文学艺术之所以可以全球化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在基础。文化诚然是人性化的产物，诚然具有地方性、区域性、民族性，诚然需要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培育，诚然不同于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利用，然而，这并没有否定人心是可以相通的，并没有否定西方人和东方人，黑人、白人、黄种人等在思想、行为、情感等方面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互相理解、互相融合的，是可以取得价值共识的。不同的民族“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的相通性突出了和彰显了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共性、普遍性，这是全球化的可能性的前提，同时它又是建立在民族文学的差异性的基础上。用民族文学的共性、普遍性去消解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是荒谬的。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之内，还会有不同流派存在，即使同一个流派，不同的作家也必须具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个性的差异性、风格的独特性正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如果失去了这一特征，文学也就不复存在，何谈什么全球化？第二、歌德主张“跳出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这有助于克服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爱心。但爱国和民族自爱，绝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前者多是开放的交往的互利的，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封闭自私利己的。对中外人类历史的成

功经验和反面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加以总结。⑥

继歌德之后，而立之年的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1848)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世界文学的命题：“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如果说歌德从唯心的普遍人性论出发来构想“世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世界文学”则是从经济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加以立论的。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恩始终善于在社会结构中把握问题，并将经济问题作为解释诸多矛盾的切入点。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不仅天才般地发现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同时在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和发展时期就准确地把握到货币资本逐利的特点并科学的发现了其全球化运作规律。马恩在19世纪所作出的诸多论断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马恩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问题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及思想深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马恩首先阐明的是

物质文化即居于基础地位的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接着他们也略微涉及这种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全球化的影响——资产阶级迫使别人“推行所谓文明制度。”第二，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结果，同时反过来它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三，马恩在论及经济领域、物质生产（物质文化）的全球化时，跟着必然也推及精神生产（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他们预示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并且瞻望了未来将由各种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前景。当然，这里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

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

在中国被动接受世界文学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世界文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已然进入一个全球一体化时代，中国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也相应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新特点。同时人们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内涵也有了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所谓民族文学，是指民族历史筛选（共时筛选和历时筛选）后的母语创作文学成果，这些成果代表着不同历史时代的文学水准和文学成就，并且在民族精神意识上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共时影响和历时影响），具有普遍性接受品格和绵延性存在品格。所谓世界文学，是指那些不仅在本民族范围内发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有其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不仅在民族范围内产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学意味，或者说进入世界文学圈内。^⑧对世界文学的这一科学阐释，既涵括了以往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各民族文学的集合和各民族文学的聚焦的合理成分，又克服了“集合论”和“聚焦论”理解的偏狭。在当下新的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随着中国由人口大国向经济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发展策略和模式也必须作出重新的思考。在遵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中国文学应循序渐进地处理好如下关系：

首先，处理好中国本土文学间的关系，诸如“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雅与俗”等关系。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汇集了满、蒙、回、藏等五十余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这是历史上不同民族间

相互战争、碰撞、沟通、交流、融合的结果。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苗文化、蒙文化、藏文化等不同地域的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大约从《诗经》时代开始，各部族——民族语言文化间的交流，随着各部族——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日益明显。历秦至汉，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华夏与西北的联系；南北朝的对峙，实为南北文化的分野；日益强大的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到辽、夏、金、元，一步步取得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统治权；由明到清，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统治华夏文化，然而（文明的）弱者统治（文明的）强者的文化现象，不仅没有削弱或消解汉文化，反过来却通过碰撞、沟通、交流、融合，整合壮大、生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⑨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民族的作家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出无以计数的民族文学作品，即便是他们用汉语言来创作，其作品仍然带有其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特点。因此，在民族林立的中国其不同民族文学间可以进行相互文学比较。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学内部这种民族间的文学比较看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的一种反省性认识，同时这种国内民族文学间比较对对跨国度比较文学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印度这样国内民族林立的国家同样可以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所组成的国度进行内部的民族文学间比较研究同样意义深远。因此，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不能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其国家大多为非多民族国家。^⑩

处理好中国文学“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对“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雅与俗”等一系列关系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带有边缘性。边缘的东西没有模式化和僵化，处在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极具活力。边缘的活力，既表现在精神思维的原始性、原创性和多样性，具有超越中心部分模式化、模仿化和僵化的倾向，又表现在它是对边缘外进行接触的前沿，在古代中国西阻于山、东阻于海的情形下，它的文化未定型性往往通过一些交通孔道，成为外来文明传向中原的中介站。即便是从事汉语正宗文学的写作，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带着特殊的文化基因和世界感受，出手不凡，给文坛送来新情调、新境界的惊喜。⁽¹¹⁾

其次，处理好与印度、伊朗、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民族文学关系，进而处

理好与其他“东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这是在处理好中国文学内部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理性认识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而在东方文学范围内处理好中国文学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关系。在中国所谓“东方”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专就中国而论，古代所谓东方纯粹是一个地理概念。以中国为中心，在西边的称西方，在东边的称东方。在佛教信徒眼中，印度是西方极乐世界。在几千年的长时间内，在中国人心目中印度属于西方，描写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的长篇小说就叫《西游记》。到了明代西方的概念又有了变化。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地方已经越出了海南、南海或者南洋的范围，而是包括了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东部在内。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属于西洋的范围。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都是在“中国中心论”的基点上来看待所谓东方和西方的。从鸦片战争开始，所谓东方和西方就不再以中国为基点，而是以欧洲为基点，成了“欧洲中心论”了。到了这个时候，不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算是东方，连以前我们中国人认为是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成为东方了。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的东方和西方被改变为一个政治概念。季羨林先生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中把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在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之间，交流活动是经常的。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是既接受，又给予，从而丰富自己，增添了发展活力。在遵循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季先生把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情况独立发展。在这里，民间文学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多新的东西往往先在民间流行，然后纳入正统文学的发展轨道；第二，受到本文化体系内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影响。本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也时时侵入；第三，形成以本国、本民族文学发展特点为基础的、或多或少涂上外来文学色彩的新文学。⁽¹²⁾中国古代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东方文化圈内的交流为主，历史上中国与印度、波斯帝国等西亚国家、越南等南亚国家以及与日本文化的交流足以体现这一特点。以西方文化使者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等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体系与中国文化体系的交流，究其深度和广度而言远远无法与中国文化体系在东方文化圈内的接触、交流相比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西南、西北民族及其地域在

中国与东方文化圈内所做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中介性的作用。东方文学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天地，总结历史上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对于保护发展我国的文化遗产，还是进一步坚强促进与东方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间的交流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最后，处理好与西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诸如中德、中法、中英、中美等关系，进而循序渐进的处理好与其他西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利玛窦、德国的思想巨人莱布尼茨和著名文学家歌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文化使者做出巨大贡献，但由于这一中西文化交流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并且两个文化体系中心距离相对遥远，其文化交流受到时空上的诸多限制。在全新的全球化（或地球村）“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语境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间的主要需解决“独语与对话”“中心与边缘”等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文学的生存语境下，任何一个民族文学既有独语形态，又有对话形态，它们作为对峙而又不可或缺的存在事实呈现出一个民族文学完整的生存状态。这里的独语与对话都是建立在彼此双方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否则就带有语言法西斯的味道。所谓“独语”，并非限于个体的言说方式，而是指内倾语境的民族言说行为，它包括：（一）语言本体的孤独；（二）话题的孤独；（三）话语氛围的孤独。就话语的独语特性而言，一般认为民族的现实生存话题或者文化及文学话题，未必都是其它民族正在关注或者有兴趣关注的焦点，但同时它对民族自身的当下演进而言又有其别无选择性，民族因此而应说、能说却始终还只不过是自说。所谓世界语境无疑应该是集体性在场，由此而形成语种文化间的公共性谈论氛围，然而这终究只是理想主潮的学理设定，几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某一种或某几种语种文化的暂时缺席。独语语境的存在，并非与封闭或开放成直接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在世界交往频繁和世界文化融合时代，独语依然会存在，而且有其存在合法性。其合法性体现为：（A）不可对话。这一点，乃是由民族的精神个体性所决定，意即一种文化的生存内涵和言说方式，总有其自在和自为的方面，而以一切自在自为之内容，实际上并不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实现跨文化参与者之间的“说—听”在场性关系，所以一切“说”都只能是独语，或者通俗地说“自言自语”。（B）不能对话。这一点，乃是由民族利益所

根本制约。从长远的人类命运看，各民族的文化利益显然带有终极一致性，然而这丝毫不能排斥现实利益的单位切分，及走向整体或走向完全的共在并非相同的过程，承享和付出的差别，强势和弱勢的差别，言说和倾听的差别，将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内表现得非常突出。(C) 不必要对话。这一点，乃是由世界语境的谈论质量所决定。既然存在着独语语境，也就有与之相吻合的独语文学。要想使“独语文学”的边界相对清晰，必须首先排除如下三种误解：(A) 将独语文学理解为一种风格文学现象。(B) 将独语文学理解为一种自弃文学现象。(C) 将独语文学理解为一种对抗文学现象。所以，我们所首肯的独语文学，乃是民族暂时离开交谈语境后的自我精神反思，在一种文学地言说过程中展开着民族的独立生存空间。民族文学理所当然地要在世界情境中出场，并以热烈的姿态同其他母语文学交谈、交流、交汇直至交换，有如个体之必须经常保持对群体公共活动的参与态度。但是，民族文学也不得不时时退场，冷静地回到自己栖居的家园，有如个体之可能在独自状态中内省、哀叹、感喟乃至呐喊和咆哮。日常经验中，一个人如果终日只是顾及或热衷于同别人对话，人们便有理由怀疑其精神紊乱。^[13]中华民族的文学就带有极强的独语特色，其独语的具体表现在它记述中华民族独特的内部生活、揭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隐秘、表达中华民族独特的言说方式。中华民族的文学的独语特点，与上文提及的中国地理环境数万年来大致保持着如下几个特点密切相关。在现代生存情境里，在交往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完全不成其问题的前提下，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交往的疑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话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对话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碰撞、接触、沟通、交流，它是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高级发生形态。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当下的中西文化对话必须建立在彼此独立性、公平性、合目的性和标准的相对一致性等诸多前提的基础上。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化的地位发生了由东方区域中心到世界边缘的转化，这一边缘文化成为被欧洲中心文化牵引的相对落后的文化，相应边缘位置的中国文学也总是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的牵引。在殖民主义的话语氛围里，“边缘”不仅象征着文化落后的客观实在性，还意味着“边缘”对中心的绝对臣服，而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中，必须承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宗教歧视等一系列迫不得已的苦难和“阵痛”。这种“阵痛”被认为是边

缘文化民族进入世界文明状态所必不可少的过程和环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面临着诸如失败的痛苦、失尊的尴尬、失语的无奈语境压力下，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为我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做出扎实的富有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鉴于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不可取，自轻自贱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同样要不得。马克思关于艺术发展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思想，对我们当下处理中国文学与西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同时，世界文学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够恒常不变地保持其中心地位并持续地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学。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渐次呈现出的中国本土文学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东方国家”民族文学间的关系、中国文学与“西方国家”民族文学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每一层面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几乎每一层面都面临着许多基本相同的话题，诸如“中心与边缘”“独语与对话”等。因此，每一个层面问题的解决对其他层面问题的解决都具有示范意义。在全球化背景和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我们认为中国文学要在处理好与“东方国家”、“西方国家”民族文学间关系的同时，应进一步下大力气做好中国本土文学关系研究工作，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最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8页。

② 参阅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梁一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④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⑤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13页。

⑥ 参阅杜书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载严平编著的《全球化与文学》，山

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⑧ 王列生：《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⑨ 参阅徐扬尚：《中国比较文学源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8-9页。

⑩ 参阅季羨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26页。

(11) 参阅杨义：《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载严平编著的《全球化与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2) 参阅季羨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299页。

(13) 王列生：《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78-185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 严平编：《全球化与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 梁一儒、户晓辉、宫承波：《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 徐扬尚：《中国比较文学源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王列生：《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 季羨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14]于国瑞主编：《中国文化历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金涛、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与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